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主编/高介华

中国军事建筑艺术（上）

The Art of Chinese Military Architecture

吴庆洲/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主 编/高介华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中国军事建筑艺术（上）

The Art of Chinese Military Architecture

吴庆洲/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序 言

本书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建筑及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古堡、村寨的艺术特色的著作。

说到军事建筑,人们会立即联想到古代的城池。从20世纪下半叶起,中国考古工作者陆续在神州大地上发现了数十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址,其中有距今4500年以前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距今约4400年前的河南登封告城的王城岗古城。20世纪90年代文物考古界公布,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并发现了6500年前的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稻田,而澧县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发现了8000-9000年前极为丰富的稻作农业材料。^[1]澧县城头山古城址的发现,突破了中国早期的城起源于距今4000多年的时限,该古城有城有池,形制已具,说明中国6000年前已出现城池。而距今9000年前,已出现稻作文明。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揭露出一座距今七八千年的农业文化聚落遗址,四周有宽约1.5至2米的壕沟环绕。而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也是距今七八千年的环壕聚落遗址。^[2]这样,中国古代用于军事防御的城池之池,至少在8000年前已经出现。中国军事建筑艺术是伴随中华文明之光而出现在8000年前的神州大地的。其历史之悠久令世人惊叹。同时,中国军事建筑艺术之博大精深、异彩纷呈,更足以使世界各国称颂,令炎黄子孙自豪。

全书包括史前篇、城池篇、国都篇、金汤篇、边防篇、海防篇、古寨篇、特色篇共8章,从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的全方位上论述中国古代军事建筑的历史、文化源流、地理分布、建筑类型、规划布局、技术特色、艺术特色、文化哲理、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并与世界各地军事建筑的规划布局、技术、艺术、文化特色上的比较研究,从而勾画出中华军事建筑艺术的全貌,确定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明了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及其古为今用的重要价值。

著者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热忱,从历史学、考古

学、天文学、地理学、水利学、宗教学、神话学、哲学、军事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等多学科角度出发,进行多角度的考察,以系统论的观点组织各种材料,采取实地调查考察与查阅文献资料相结合,考古发掘成果与历史文献的对照、印证相结合,军事防御功能研究与多功能系统工程相结合的方法。因此,多学科交叉、多角度的考察、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是本著的特色。

以往在这一领域已有若干研究中国军事建筑之著作,如《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所编之《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1],张驭寰所著《中国城池史》^[4],施元龙主编之《中国筑城史》^[5],杨秀敏、徐飞、邬建华所编著之《坚韧的盾牌——中国筑城史话》^[6]等,但研究角度不同,故内容、成果均不相同,各有其特色。本著运用了多学科交叉、多角度考察、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故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特色。

[1] 张文绪. 澧县梦溪八十垠出土稻谷的研究. 文物, 1997, 1: 36~41

[2] 朱乃诚. 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和古墓葬. 文物, 1997, 4: 82~88

[3]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 中国军事史. 第六卷, 兵垒.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4] 张驭寰著. 中国城池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5] 施元龙主编. 中国筑城史. 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9

[6] 杨秀敏、徐飞、邬建华编著. 坚韧的盾牌——中国筑城史话. 清华大学出版社,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总序(一)

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吴良镛

1 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

1.1 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20—1930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況。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广义地看,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核心竞争力,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资源。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才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却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

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1.2 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神伤。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阴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1.3 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1]。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2]。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3]，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前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

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的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

2 “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

2.1 一本书的启示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诸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了《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4]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5],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Hall)在写了《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6]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7]一书,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像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也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该书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像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2.2 中国的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題,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8],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9]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10]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道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10]

3 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11]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懈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12]、地域文化^[13]、地区建筑学^[14]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的探索。

(1)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

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15]。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16]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7]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

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像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意匠的关键之点。

(3) 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

(4) 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

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18]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真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5) 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收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乃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4 喜赞“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与发行

从文化角度研究建筑,或从建筑论文化问题,应视为近十年来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一大进展,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提出(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自1989年在湖南大学“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召开的“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前后开了6次会议,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二是1996年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在高介华先生的努力下,组织“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计划出书30余种,蔚成系列,短短几年,已见成果,将在今年10月庐山召开的会议上先推出第一辑。我尚未读过书稿,但“文库”总目所列,正是涉及中国建筑文化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是值得加以研读的,也正是我个人渴望猎取的知识。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建筑研究以大的推动,欣喜之余,聊书感怀,权代总序。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与人文两方面的结合;写这篇文章时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文化方面的探讨只是尝试之一,思考还远不成熟,但结稿时间在即,匆匆提出,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研究。

2002年8月25日

[1] 赖纳·特茨拉夫.全球化——第三世界——前景忧虑与赶超希望之间的文化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 据美国百人会在1995年做过的一次调查,“美国人在不少方面对中国持有否定态度,但美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却有强烈的肯定和崇敬的态度与浓厚的兴趣。”见:Shirley Young. *Cultural as an engine for Shanghai's development* (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年7月25日

[4] Mumford, L.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5]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倪文彦 宋峻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6] Hall, P. *Cities of Tomorrow*.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8

[7] Hall, P. *Cities in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2001

[8] 周向群主编.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9] 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年7月25日

[10] 吴良镛.基本理念·地域文化·时代模式——对中国建筑发展道路的探索.建筑学报, 2002(2); 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文化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

[11] 刘秀峰同志,共和国第一任建设部长,可以被看作建筑界行政官员学习专业的代表,对建筑学专业他有两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在1950年代批判所谓“复古主义”后的1958年,他在上海组织了建筑理论座谈,探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二是在1960年代后期,他组织了古建筑研究老中青的代表人物参加,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他也亲自筹划、组织并伏案编写,终能在文革前夕得以完成,实功不可没。

[12] 1985年在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城市文化”,中国重庆;文章修改稿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13] 吴良镛.地方文化与全球文明: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1997年9月现代乡土建筑国际会议大会主旨报告人之一,中国北京

[14] 吴良镛.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8(3);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1995—1996,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吴良镛.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7(1)

[15] 皮特斯.作为杂合的全球化.见: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6] 吴良镛.关于古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学报,1999(4)

[17] 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

[18] 吴良镛.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的学术报告——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建筑学报,2000(7)

总序(二)

齐 康

泱泱中华,方圆九州,五千年古国,星移物换。西起世界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东至太平洋的东海岸,在这片广大的地域中,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江河湖泊,所有这些大自然的赐予,滋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由汉、回、壮、藏、蒙等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丰富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她有着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积累、融合和创新,虽经无数次纷争离合,但始终凝聚着一种精神,那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永远向上的精神——民族魂。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她蕴藏着强大的凝聚力,颂扬着自己的文明,荣耀着自己的文化,不断抗击着外来者的入侵。古代四大文明中,有的消失了,有的残缺了,有的转化了,惟有中华民族的文明能不断继承、发扬和创新,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她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亮。虽然经过了屈辱的年代,终能坚强地站起来,为世人刮目。近百年来,她屡遭列强的侵略、蹂躏,英雄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经过了短短的五十年,焕发出青春。人民需要历史的记载,人民需要历史的回忆、历史的总结,更需要历史的开创,让存在和延续了五千年的文化具有新的魅力和价值。这个价值是我们伟大民族存在的基础,是启迪我们未来的信念和信仰的基石。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忘却和割断自己的历史,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广博,不论是在音乐歌舞、诗文书画中,还是在典章文物、礼俗制度中都蕴涵铭记着中华民族深沉的情感,反映出他们的审美情趣,哲学思考。而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建筑艺术的表现最具有综合性,表现方式独树一帜,表现效果遒劲有力。建筑是艺术和生活的空间载体,是技术和艺术的结晶,是文明形成、发展的物化体现。

原始人群聚集生活开始后,尝试用树枝、泥土、石头等原始材料来构筑生存空间,建筑活动开始了。在进一步的演化发展中产生了城市,城市是人类高效的聚集形态。中国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形制,作为社会体制的空间体现,具有显明的东方特征,是世界城市史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城市是农业社会的城市,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市。中国古代建筑受宗教、礼仪的影响,受儒家思想的制约,有严格的等级性。王城之内,宫城居中,前朝后市,早在周代,已有都城“营国制度”。中央政权统治和管辖着地方行政,控制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以行政体系为主的城镇体系。在汉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下,少数民族城镇仍然保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必然依托区域政治、经济特点和文化特点,且受到民俗文化的影响。丰富的城市形态遍布于全中国,并不断地延续其生命力。虽然它们有的被战争破坏,被自然灾害所湮灭,但对于它们的发掘和研究仍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生命力延续的象征。中国的城市选址注重依托水系,水系依托大江大湖,江湖依托自然生灵,自然生灵的生存离不开古代的自然生态。虽然经过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但中国城市始终存在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历史形态和形象特点,始终得以保持,那些壮丽的城墙、城门、城楼、护城河等构成了城市的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性建筑形象。

山地的城市与建筑,为适应自然地貌的特性,沿着蜿蜒的山麓,利用易于建筑的地段,与山形和自然环境浑然一体。都城的选址,意在“象天法地”。北京城选址在华北平原,历经千年修葺,特别是明代的大规模建设,使之成为世界城市的瑰宝,保留了最为完整的城垣。西安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朝代的更替,依然保留了城墙和城市结构的特点。南京是一座宏伟的城市,明代建设的城墙,宽达9m,高13m左右,至今没有哪个城市能比过它的。它顺应自然形态,蜿蜒于钟山之下,北起长江,南至秦淮河,城中有山,山中有水,是适应自然与军事防御相结合的城池典范。东海之滨,历史上有许多海防城市,如惠安崇武古城至今保存完好,在抗击外敌入侵中起过很大作用。中国最宏伟的城墙是长城,从战国时始筑,至明清一直修筑不止,成为人造卫星上可见的中华长龙。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从风光绮丽的北国到绿林茂盛的南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隔绝,影响了各地区人民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区的城镇和建筑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不断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些都是中国城市 and 建筑发展历史的丰富资源和历史见证,更是新时代技术、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布达拉宫,没有长城,没有故宫、天坛,没有承德避暑山庄,没有各地民居和少数民族的建筑等等,又怎么能够让人们完整地理解中国丰富的古代文化。中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它们为载体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生

活的文化。文明是文化的凝结。中国各地的民居绮丽多彩,由于各地的气候、地理、人文、生活习俗之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并仍统一在相对固定的院落模式中。从冰封千里的东北看厚大石墙的四合院,从云、贵、黔山地看山寨的吊脚楼,从闽江、珠江流域看飘逸通透的闽粤民宅,真是缤纷多彩。又如皖南民居依山面水,一簇簇、一群群,展现着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情。除黄河、长江外,我国还有许多重要的河流,孕育、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建筑文化。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人们利用黄土夯筑墙垣、城墙,城楼建筑十分壮丽。窑洞民居,浑然天成,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中国的山林一般都与人文文化相融合,如泰山、华山、衡山、峨眉山、武当山、武夷山、雁荡山等等,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都深含文化根基。中国的山水是文化的山水,是与人民息息相关,有血有肉的山水。

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水平,曾经达到了世界建筑文化的顶峰。建筑以“间”为单元,形成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并以砖、石、土材相配合,形成一种特有的组合体,它们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城市营造中的朴素自然观,曾创造了宜人的人居环境,城市、建筑、园林是一个有机整体。城市的选址依托大自然,城市周围或有绿色的山林,或有优美的水面;城市中的水网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水系,沿主要水系形成绿色地带。都城中按方位的不同建有皇家坛、庙,皆有大片绿地林木环抱。城中官衙、民居的合院以至私家园林也均有绿化,更不用说皇家园林了。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园林一体化,组成了适合人们游憩栖居的良好人居环境。

中国古代建筑虽以“间”为单位组成四合院,但相互组织的单位是“群”,“群”是中国建筑的基础。“间”和“群”是体现和谐之美的所在。这些“间”、“群”又与自然山形、水面结合,丰富了山水城市的内涵。在城市中,“间”和“群”又形成分层次的街巷空间结构,城市群落有机的组织是中国城市美的主要特点。这些山水城市注重宅第的选址、排水,及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街坊、里弄成为组织、管理生活的基本要素。以“间”为基本单位,形成单体,再由单体围合组织成建筑群体。群体的组织,反映了社会层次的高低,也反映出贫富的等级性。故此,我们便能看到故宫壮丽、天坛均衡、孔庙庄严、民居活泼的各类建筑群体。木构架的使用和形制的完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重要特点。举架、开间作为形制的基本标准,既可适应社会组织结构中不同等级层次的要求,也能适应不同建筑功能的需要。四合院空间的穿透组织,不论是连续的建筑群,还是独立的一颗印民居合院组合,都具有内向封闭的空间特点。由于防御和气候的需要,也多采用内向的院落式布局,强调围合。院落式的围合布局形成了建筑和宅居的群体。由于南北气候的不同,乡村和城